

经济学汉译文库

[美]理查德·富兰克林·本塞尔 著 吴亮 张安 商超 田启家 译 孙宇 韩宇 校

美国工业化的政治经济学

1877~1900 年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AMERICAN INDUSTRIALIZATION 1877~1900

Richard Franklin Bensel



长 春 出 版 社

经济学汉译文库

美国工业化的政治经济学：

1877~1900年

[美]理查德·富兰克林·本塞尔 著

吴亮 张安 商超 田启家 译

孙宇 韩宇 校

長 春 出 版 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美国工业化的政治经济学: 1877~1990 年/[美] 理查德·富兰克林·本塞尔著. 吴亮 张安 商超 田启家译. —长春: 长春出版社, 2008.1
ISBN 978-7-5445-0494-2

I. 美... II. ①理... ②吴... ③张... ④商... ⑤田... III. 工业化—政治经济学—研究—美国—1877~1990 年 IV. F471.2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7) 第 150092 号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American Industrialization, 1877-1990.
Richard Franklin Bense

Copyright © Richard Franklin Bense 2000

Subject to statutory exception and to the provisions of relevant collective licensing agreements, no reproduction of any part may take place without the written permission of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First published 2000

经济政策与技术绩效

著 者:[美]理查德·富兰克林·本塞尔

责任编辑:程秀梅

封面设计:郝 威

出版发行:长春出版社

发行部电话:0431-88561180

总编室电话:0431-88563443

读者服务部电话:0431-88561177

地 址:吉林省长春市建设街 1377 号

邮 编:130061

网 址:www.cccbs.net

制 版:恒源工作室

印 刷:长春百花彩印有限公司

经 销:新华书店

开 本:787×1092 1/16

字 数:700 千字

印 张:33

版 次:2008 年 1 月第 1 版

印 次:2008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49.00 元

版权所有 盗版必究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印厂联系调换 联系电话:0431-84687000

序言

本书旨在阐述 19 世纪最后数十年，美国的民主与发展为何能够共存。民主制度和选举实践远非是完美的；暴力猖獗，欺诈横行，剥夺人民的立法权力玷污了整个美国的历史，特别是在 1890 年以后的美国南部地区，这些历史污点俯拾皆是。但是，如果我们拒绝承认大众化的情绪对主要政党政策设计的影响，如果我们拒绝承认大众化的情绪对发展制度构建的影响，我们就无法真正理解那个时代美国的政治经济格局。政治参与热情之高，政治主张表达之顺畅，有组织的叛乱之普遍，以及广大人民感觉到选举的结果是如此重要！从这些方面来看，相比于当今的美国而言，19 世纪晚期的美国可以被看成是一个民主时代；相比于当时和后来的其他发展中国家而言，美国也处于政治发展光谱的民主一极。

在本书中，经济发展是与工业化等量齐观的：从以农业为主导的社会向以工业为主导的社会转型，包括在竞争性的世界经济中，开发和出口高技术制造业产品的能力与日俱增。这显然是一个比某些学者可能假设的更为苛刻的发展概念。例如，最后的条件就是旨在排除那些工业化发展进程过于缓慢以至于一个国家永远不可能在世界经济中与其他先进国家相竞争的那些情况。也因为如此，相比于当时和后来的其他发展中国家，美国显然处于大规模工业化的顶点。

本书所提出的问题是，在 19 世纪晚期，为什么美国能够同时满足经济发展和民主进程的苛刻的先决条件以及美国是如何同时满足经济发展和民主进程的苛刻的先决条件的？通过展示美国作为民主和发展并行不悖的典型示例，本书不仅指出了开展跨国比较研究的可能性，而且更为重要的是，尝试将政治学 and 经济学融为一个动态的过程。将两者连接起来的最重要的因素就是政府的政策。从这一模型的民主方面来看，各项政府政策就是来自于不同社会群体和阶级的政治要求，并由参与竞选的政党在政治纲领中将大众的诉求表达出来，再由政府机构的大众代表制定立法。从经济发展方面来看，政府政策或者推动，或者阻碍资本投资和更有效率的生产方式的出现。因此，经济发展将一系列必要条件强加给各项政府

政策：工业的资本投资必须发生，生产方式的组织改进必须出现，市场的规模和性质不能限制投资和技术创新。民主也同样施加了一系列重要的条件：全体公民拥有投票权，有能力自由地提出不同的政策选择，新的政党不受限制地参加竞选，以及通过当选的官员控制政治机构。

相对于美国民主与发展之间的问题，这里存在着一种解决方案——各项政府政策的一系列重叠，既在政治选举中认可了公民对财富的政治主张，也使得工业的资本积累和投资达到了很高的水平。绝大多数发展中国家一直未能这样做，所以，现在就无法如美国那样幸运。使美国的民主和发展得以良好运转的各项政策，并没有被记载在各种技术手册之中，也没有被记载在各种学术文献之中。他们起源于丰富多彩的民主政治的粗暴和横冲直撞以及资本家和他的代理人对市场和投资的务实的理解。正是因为存在着这么一个解决方案，才需要有一个中间人，针对财富的民主主张与资本投资的运行必要条件之间的矛盾进行调停。这个代理人就是共和党。作为一个组织，共和党并不是铁板一块；党内精英并不能在经济上或其他方面规定政党的路线。当共和党全国的政治宣言损害各州共和党组织在地方选举中的竞争力时，各州的党组织通常选择要么不理睬共和党全国的政治宣言，要么提出异议。而且，即使共和党的正式成员——那些赞成和支持该党核心政策原则的党员，在选择结果显示大众意见发生转向的时候，他们也会各奔前程。然而，不管怎么说，共和党为经济发展铸就了一个有效的政治框架，回击了来自民主党和那些具有反叛立场的第三类党派的种种挑战。

这一框架基于三项政策：对工业的关税保护、坚持国际金本位制以及为劳工和生产构建一个不受约束的国内统一市场。共和党可能从未依据他们自身的优越性执行过这些政策，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它既是工业和金融精英的代理人，又是一个大众化的政党组织。这一双重的角色显然处于紧张状态，在南部地区、大平原地区和西部地区表现得尤为尖锐。作为回应，该党构建了一个颇具说服力的意识形态观念，这些政策既对普通选民具有重要意义，同时更重要的是，对具有战略意义的地方社会群体予以单方面的资金补偿，借此拓展和强化共和党作为发展的代理人形象。在共和党政治纲领中，所谓的“关税政策联合体”就是最为重要的单方面资金补偿的来源，既为参加过内战的联邦退伍战士的庞大养老金体系提供收入来源，也为全国生产羊毛的农场主提供了关税保护。从经济意义看，尽管这种保护性关税政策并非发展所必需的，但是，它却成为共和党政治纲领在政治上赢得大众支持的绝对必要的支柱。因此，在美国工业化的进程中，关税的主要作用就是为共和党建立了一个广泛的联盟，而不是促进经济发展。因为贸易保护相对于美国工业化而言在经济上并不是一个本质的问题，所以，关税问题就转交国会

处理，而国会则由代表广泛不同利益与群体的贸易保护主义者组成，这些人在委员会和会议室中赞成采取关税保护政策。

实际上，保护性关税为共和党提供了一笔政治“盈余”，借此共和党就可以构建他们所描绘的发展三角的另外两根经济支柱：统一国内市场和金本位制。这两项政策在政治上都极易招致攻击，但是，在经济上却比关税政策更为重要。例如，统一国内市场要求压制来自各州和地方管制州际贸易的企图——这是一个唯有最高法院才能执行的项目。由于美国奉行司法独立，法官终生任命的制度能够确保法官不易受到来自外界的干扰，共和党的法官们进一步发展了宪法原则与精神，取消州政府与地方政府几乎所有的且最为微不足道的针对州际贸易的管制措施。金本位制要求联邦财政部的积极管理，因此，金本位制是一项执行的职责。相比于国会而言，行政部门所受到来自民众的压力要轻得多，相比于最高法院而言，总统却更为容易受到公共意见的影响。事实上，围绕着发展政策的斗争，货币体制就是一个主要的战场，国会经常强烈地反对共和党（并且，正如后来所显示的，也包括民主党）总统所不懈追求的保守性金融体制。

对这一模型的细节及其复杂关系已在本书第一章和最后一章得到了翔实的阐述，此处不予赘述。然而，关于这一模型的几个颇为重要的方面应在此简要提及。首先要提及的是共和党作为一个发展代理人的观念，在回应美国工业和金融精英所传播的经济发展的基本需要的同时，却始终牢牢地坚持全面的民主政治。作为一个发展的代理人，共和党完全可能被来自选民的政治要求与工业化的政策必要条件之间的激烈冲突所彻底分裂。然而，它却在这种激烈的冲突中存活了下来，并且最终将这一角色演绎得繁荣昌盛。这一切并非由于其天才的政治远见。恰恰相反，共和党的成功有赖于其一系列务实的政策调整过程：共和党制定出诸如像关税保护这种让富人与平民均能受益的政策，获取丰厚的政治租金，而后再大胆地做出像统一国内市场和金本位制这样尽管备受争议，然而却得到精英阶层有力支持的政治投资。因此，无论从政治的意义上，还是经济的意义上，共和党完全是不折不扣的发展代理人。

第二种观念是关于政府机构对大众政治和政治主张的相对独立性。不受欢迎的政策（即那些为赢得选民支持，政治投入与回报明显不成比例的政策），除非它们在经济上是绝对必要的，否则就不值得追求。如果这些政策确实是绝对必要的，那么，就必须对他们的执行进行明确的绩效评估（举例来说，每个人都可以评价，美国是否应该执行金本位制）。然而，如果这些政策不受欢迎，那么，共和党就不可能为犯错误留下太多的余地（因为该党将力图把这些不受欢迎的政策的政治成本降低到最小程度，唯有那些绝对必要的政策除外）。事实上，在全部国家机构

中，在政治上最开放的部门可能会发现，执行不受欢迎的发展政策是非常困难的，甚至是不可能的。例如，作为联邦政府在政治上最开放的机构，国会仅在关税政策上是可以信赖的（并且，国会几乎一手破坏了金本位制）。国会在统一国内市场方面到底做出了什么贡献，从来没有得到验证；最高法院能够成为国家发展三角的一根主要支柱，在很大程度上是基于其自身的努力。

至于这一面临大众压力的相对独立性，宪法当然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宪法的作用，不仅在划分这三个重要机构在国家发展的权限上，而且也体现在联邦政府与州政府的权力分配上和强制实行联邦体制设计上。但是，宪法在某种程度上并未能规定实际所发生的发展责任的界限。各项政策完全可能以不同的方式进行设计。例如，在国会所通过的关于关税的法定协定，完全可能为行政当局与外国的贸易谈判所缔结的贸易协定所取代。宪法教条并非板上钉钉，不可改动。州际贸易条款的双重主权解释和宪法第十四修正案实质性的法定正当程序，既不是对法律教条的刻板推定，也不是来自历史的古老遗产，完全是充满想象力的创造之举。在非常有限的界限内，共和党能够运用它们的判断力，不仅将发展政策的主要责任委派给不同的机构，而且为美国式的工业化精心设计了宪法原则。简单来说，宪法确实提供了一个相对灵活的框架，共和党在这一框架内构造了美国的发展型政体，然而，尽管这里的美国经验少得可怜，但是，美国经验表明，一部恰当设计的宪法就是一个国家所需要的，并将保证民主与发展可能是兼容的。

最后要提及的是关于政党的观念，作为一个发展的代理人，一个政党以某种方法将从如关税政策这样益处多多的政策中所获得的政治租金，再运用于像金本位制和统一国内市场那样政治代价高昂的政策中去，似乎是特别值得重视的。如果没有一个政党组织的话，发展政策之间的交叉补贴可能就不会发生；事实上，保护性关税政策可能完全不是一项发展政策，相反，一项完全无用的政策就会压制工业化。在解释关税政策如何在经济上补贴经济发展的过程中，我们需要一个政党组织作为连接精英利益、政策执行、政府机构和大众意见之间的桥梁。

上述这一简短的列举并不能详细阐述对美国工业化过程政治经济格局的一种理论解释的所有可能。读者可能会发现浮现在本书字里行间的好多其他的观念，其中包括：区域发展不平衡格局、跨区的财富再分配以及不同的地区所提出的收入分配的政治主张。其中有些观念有助于提醒我们，在一个社会中，经济发展过程并不经常是一个改进所有地区或所有社会团体状况的过程。例如，19世纪晚期所制定每一项发展政策几乎都没有给美国南部地区带来什么实惠，更为甚者，在美国南部地区，尽管黑人们效忠于共和党，但是，北方所领导的工业化使黑人比其他任何社会团体所做出的牺牲都多。

我希望，这一解释模型能够充分地说明在美国工业化期间所发生的一切。正因为如此，本书拥有一个非常全面的议程。对于政治史学家们而言，我试图从历史的故纸堆中把关税和货币政策挖掘出来。长时间以来，镀金时代的美国政治研究总是计较于呈现一些实际上并不怎么重要的争端（关税与货币政策据称高居榜首），或者埋头专注于各州当地禁酒与宗教方面的文化争斗。这些都不应该是实际情形。对于经济史学家们而言，我试图将政治作为美国工业化的一个主要因素。对工业化的传统解释一直始于这样的假定：一个不受约束的国内市场的存在几乎可以从国家诞生之日算起。然而，不受约束的国内市场并不像铁矿石矿床或其他自然资源一样天生存在，而是政治上构建的社会现实。它们是如何被构建？又是如何被维持下来的？这些问题就如同这一时期其他的纯经济问题一样，为我们的分析提出了既极其困难，又颇具意义的挑战。

对于研究美国政治发展的学者们而言，我呈现了在意识形态观念、对政党要求的大众反应以及决定全国政治经济格局的现实之间的强有力的联系。作为一个学术共同体，我们经常忽视一小撮平庸无奇的政治人物。在一个民主政治的体制内，复杂而又和谐的内部逻辑是不存在的；我们在意识形态想象中所寻找的成熟的观念只能为在政治实践中所发现的观念所取代。共和党，作为一个主要的范例，研究它的优点并不是启发杰出人物蓦然发现生产性的公司—州之间的秘密关系，而是使学者们注意到，共和党作为一群雄心勃勃的政治家的巢穴，他们（共和党）不仅仅是个人，而且是整个政党，都在与民主政治和经济发展的问題展开搏斗。对于远远超出普通民众对社会或经济的理解能力的学术理论，政客们极少敢用自己的职业生涯去冒险。共和党也是如此。共和党所面对的将群众政治与极少数对美国工业化至关重要的政策进行融合的问题已经多得数不胜数。

最后，对于那些研究比较发展的学者们而言，我提供美国这个案例。在构建这个案例时，我一直试图尽可能地做到综合全面，但是，包罗万象是永无止境的。在这里，我希望，本书能够为将美国经验与其他的民主与经济发展结合起来的成功案例（或失败案例）进行比较研究提供一个基础。但是，我不打算在本书中进行这样的比较。我所设定的目标是颇为适中的：即构造一个美国工业化的政治经济模型，使这个模型不仅内涵全面，而且在与其他国家的案例进行比较时，能够反映出异同点。换一句话说，作者在本书中仅仅意在提供一种比较的可能性，而无意深入下去。

在我写作本书的过程中，我得到了许多热情的帮助。其中最重要的帮助来自于我最亲密的同事，Elizabeth Sanders。在我将大量的时间花费在自己的研究上时，她正在准备自己的著作（Roots of Reform: Farmers, Workers, and the American

美国工业化的政治经济学：1877~1900年

States, 1877~1917)。唯有读过我们这两本书的读者们才可能回答我们的论述是否是一致的；在此，我只能说，我们之间的辩论仍未结束。多年来，我们一边吃着晚餐，一边思索金本位制对美国工业化的重要性；还有，如果布莱恩当选为总统是否会把 1896 年民主党的政治纲领转变成为法律。我记不清我们究竟吃过些什么，但是，我却清清楚楚地记得，我俩辩论时引用过的那一条条脚注至今都让我们回味无穷。

当我还在担任社会研究新学院的研究生教职的时候，我就开始了本书的写作。他们或许已经认不出现在的这本著作就是当时他们为之展开过激烈争论的那本，但是，我还是要借此机会感谢在“州的形成和集体行动研讨会”上提出建议和热情支持的同事们：Guy Baldwin, Sven Beckert, Wayne te Brake, Perry Chang, Brian Daves, Elaine Fuller, Garmenza Gallo, Jeff Goodwin, Andrew Grossman, Michael Hanagan, Madeleine Hurd, Sadrul Kahn, Ira Katznelson, Dan Kryder, Fred Murphy, Andrew Schlewitz, Charles Tilly 以及 Nick Trippel。我也必须感谢 John Gerring, Richard John, Honathan Kirshner 长期以来所提出的批评和建议。正当我对本书手稿进行润饰时，Laurinda Jackson 帮助我将本书第 1 章转变成为统领全书的观点的一章，这一方面恐怕任何人也做不到。Stephen Skowronek 和 Roger Ransom 通读了全部手稿。他们的慷慨忠告和批评再一次提醒我，一个学者的学术生涯应该具备的美德和信念。本书所以能够附有许多地图，我必须感谢 Jacqueline Bow，她为本书准备了计算机绘图，还有 Mindy Peden，他为本书输入了许多数据。至于地图的格式，应该感谢 Carville Earle 与 Changyong Cao，他们把《美国历史上的县镇边界文件，1850~1970 年》（Baton Rouge：路易斯安那州立大学地理和人类学系）一书的地图供我使用。

我希望以两种非常不同的致谢方式来结束这篇序言。首先，我要感谢的是剑桥大学出版社执行编辑 Frank Smith。我曾经提醒过他，手稿的篇幅可能比较长，但是，印刷的版本比我最初预料的还要厚实许多。在我为手稿长叹之际，他仍然将本书添加进了我所认为的政治和经济史著作最著名的系列丛书之中——这一系列丛书大部分是由他负责的。我只希望他能饶有趣味地回想起我当时的那声长叹。其次，我还要感谢我的兄弟姐妹。学术圈里政治气氛是严酷的，许多学者宁可退缩，也不愿意为实现学术研究崇高职业生涯的神圣原则而奋斗。谨以本书献给我妹妹，以鼓励她投身于使生命价值充满意义的勇气！

目 录

Contents

序言

第 1 章 导言

- 民主与发展 2
- 美国工业化概述 3
- 大众对财富的政治主张 8
- 本书概述 11

第 2 章 美国不平衡的经济发展

- 工业化与日益不平衡的区域发展 17
- 经济发展的物质基础 20
- 美国金融体系 41
- 国家金融体系和跨区资本流动综述 51
- 金本位制和纽约与伦敦金融市场的一体化 59
- 美国南部资本市场的孤立 63
- 民众对资本积累的主张 68

第 3 章 政治纲领要求、政党竞争和工业化

- 各州政治纲领 87
- 政治纲领的相关条款与统一国内市场建设 96
- 关税政策的政治纲领 101
- 货币政策与国家金融体系 107
- 劳工政策政治纲领 114

- 关于土地分配和配置权的政治条款 123
- 所得税政治纲领的条款 125
- 农业的政治纲领 126
- 国内政治的政治纲领 127
- 全国性的选举 131
- 关于国际外交和战争的政策纲领 136
- 禁酒政策 138
- 关于政党和政策所提出的相关政策条款出现频率的比较 142
- 政党政治纲领与美国经济发展 157

第4章 对财富的权利主张与选举联盟

- 反对党意识形态模型的地区基础 179
- 对于公司利润的不同分配主张：北方产业的劳资工资谈判 180
- 棉花种植区的不同财富主张：棉花抵押与种植园体系 186
- 对于粮食营销的不同主张：贷款在地区内的转换与丰收粮食的运输 189
- 美国几大标准地区的交易核心 194
- 阶级冲突，地区间财富的重新分配以及国内政党竞争 197
- 国内政局当中的反对党运动之概览：1877~1900年 200
- 平民党在1892年所带来的挑战 205
- 布莱恩与1896年的选举 216
- 序幕和尾声：美钞党和社会主义政党运动 230

第5章 国内统一市场的政治建构

- 南北战争对国内统一市场形成的影响 255
- 铁路监管 266
- 工业与商业兼并 270
- 依赖于司法手段构建起来的统一国内市场 274
- 统一的美国国内市场之起源与影响总结 293

第6章 金本位制的政治治理与捍卫

- 金本位制和货币稳定性的政治支柱 315



美国国会中的政党力量 and 经济发展	316
政党成员的政治—经济特征	318
行政部门与金本位制	321
国会对金本位制的支持	325
主要金融提案的国会结盟	327
1877~1900 年金本位制投票结盟情况的总结讨论	365
国会对金本位制的支持与总统选举结果	372
国家银行系统与金本位制	374
结 论	379

第 7 章 关税保护和共和党

关税对于工业发展的影响	397
19 世纪晚期国会的政治联盟和关税立法	403
关于制定《麦金莱关税法》的政治联盟分析	418
共和党政治联盟的政策基础：	
南北战争抚恤金、关税保护、金本位制以及南方黑人	426
总 结	431

第 8 章 结 论

各种重大的发展型政策的制度背景	447
发展型政策在不同政府机构之间的分配	453
作为发展代理人的共和党	455
民众对于财富的主张	455
民主与发展的兼容并蓄	459
索 引	462
后 记	515

第 1 章

导 言

在 19 世纪的最后数十年,美国经济经历了迅速的工业扩张,并使之跻身于世界经济的前列。与此同时,激烈的民主制度正式地配置政治权力。^①本书的主要目的旨在阐释:为什么经济发展与民主进程能够在美国共存以及它们是如何实现这种共存的。这一解释强调对财富的强烈的大众主张、民选政治的开放精神以及支撑工业扩张的十分卓著的发展政策。

本书的中心问题旨在阐明:为什么在一个民主体制下,要求对财富按照阶级进行一系列重新分配的大众主张并没有转移推动工业扩张的投资风潮。这些主张可能是可以预期的,尤其是来自那些受到工业化严重伤害的阶层与群体。然而,实际上,在整个 19 世纪晚期,在工业企业和经济基础设施领域的私人资本积累整体上几乎没有受到抑制。在解释这一结果的过程中,国家政治经济学的四个特征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工业化的区域特性;对财富的主张以不同的方式对不同地区施加压力;全国政党竞争的格局与活力;联邦政府不同分支部门对大众政治影响的敏感程度。

从最为广泛的角度上来看,充满活力的民主制度之所以能与狂飙突进的工业化相兼容,是因为:(1)对工业化提供重要补贴的美国农业部门是出口导向的南方种植园经济,并且,南方地区作为一个区域,在这一时期的国内政治中并不是一个严肃的、可靠的联盟伙伴;(2)国内政治经济格局引导制造业带的工人们关注财富跨区之间再分配(即从南方到北方)和资本的跨部门转移(从出口导向的农业部门转向关税保护的工业部门),而不是关注与资本家之间就工业利润的份额进行车间争议(shop-floor contestation);(3)作为北方工业化的代言人,共和党不但能赢得选举,而且能够成功地掌控一系列国家发展项目。总之,一言以蔽之,民主政治与经济发展之所以能够兼容是因为,最有可能对工

美国工业化的政治经济学：1877~1900年

业利润提出政治主张的主要集团（即，南方棉花种植者与北方的产业工人）不能联合起来。因为在共和党所支配的国家政治经济结构的重建和重要影响下，他们处于对立的阵营。^②

民主与发展

在民主制度下，经济发展一直是罕见的，因为在从农耕社会转向工业社会的过程中，几乎总是伴随着财富分配产生激烈的冲突。^③一个社会从劳动密集的农业和手工业生产迈向能源与机械密集的工业的快速转型必然需要大规模的资本。同时，处于迅速工业化开端的各国往往包含大量的人口，且各国为之提供食品和住所，不仅是直接的，而且是当务之急。这些当务之急经常表现为广泛的强有力的收入再分配要求出现在政治之中；这些要求一直具有明确的目标，因为资本在工厂、设备和基础设施上的快速积累暴露了一股明显可见的且潜在可转移的财富流。如果这些大众化的对财富的要求得以实现，那么，资本积累就可能受到严重压制，并因此可能排斥对工业企业和支持基础设施的投资。因此，为了保证工业化的顺利进行，这些政治要求就必须得到压制或转移。

因为民选政治的竞争机制经常至少会产生某一个政党，并使之对贫困阶层的迫切物质需要做出回应，进而迫使当政或在野的政党采纳对财富再分配的政策，所以我们可以说，民主制度或多或少是有效地再分配主张的“传感器”。^④然而，在那些缺乏民主或权威的政体中，财富再分配的主张可能会被特别适应这类目的的政治制度所压制或转化。在这些政体中，资本形成和投资可能由私有或公共机构以赶超世界经济所需的较高速度而执行。在比较美国与其他国家的工业化过程时，沃尔特·迪恩·伯纳姆（Walter Dean Burnham）曾经说过：

无论在何处，工业化的起飞阶段，无论是由资本家还是由人民代表来管理，都会是个残忍和剥削的过程。在这一阶段，一个至关重要的功能性政治要求就是提供恰当的隔离，使工业化的精英免受大众压力的影响，并且防止被那些受到资本积累过程伤害的联盟所取代。19世纪的欧洲工业化精英们通过其在封建模式下所享有的深受尊敬的社会地位，并且特别是通过将投票权限定为社会的中上阶层，提供了大量的隔绝的例证，顺利推进了工业化。^⑤

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美国的政治经济以主要政党之间的政策竞争有效地

替代制度上的独裁主义，并以这一方式限制了政党联盟的形成。换句话说，关于财富再分配的主张受到了支持主要政党之间的竞争的社会联盟的抑制。^⑥这些社会联盟，反过来，又受到国内政治经济潜在结构的决定性影响。^⑦

形成国内政党联盟的最具影响的因素是：区域间经济发展范围和步伐的广泛不平衡，以及美国农业和工业精英们之间的尖锐分裂，共同决定了截然对立的、以区域为基础的政党体制的阶级结构。在许多方面，地区间经济的不平衡发展为农业和工业精英们之间的分裂和政党竞争奠定了基础——到了这样的程度，如果非要指出一个单一的因素来解释19世纪晚期为什么没有爆发一场对财富重新分配的狂暴政治运动，那么，这一因素可能就是体现在美国地区之间政治经济格局的性质和轨道上的巨大差异。^⑧

美国工业化概述

工业化使美国从一个以农业主导的、商品出口依赖英国的国家转变成为国际体系中一个独立的、领导性的力量。在大多数的情况下，这一快速的工业扩张在美国增长方式确立之前就已经结束了。^⑨

首先，1870年之前的大量经济增长从性质上来说或多或少一直是广泛的，并与新土地的开发以及它们融入国民经济的进程是相联系的。在19世纪最后三十年里，伴随着农业充分利用土地的生产能力，增长日益强劲，转型越来越显著，并且更为重要的是，经济活动的主要重心从农场转移到了城市，从农作物的种植转向了制造业的工厂生产。

其次，与先前相比，在经济增长速度 and 部门特征方面，19世纪晚期的经济增长更加不平衡。例如，大概直到1870年，美国仍然可以根据其所有区域的许多特征被描述为一个农业国家，唯有东北地区的某些地方例外。在这一时期的早期，那些拥有相对较大边疆的地区比那些长期定居的地区经济增长得更快。1870年后，地区间经济增长模式与速度的差异进一步扩大，以至于从地区意义上来说，美国的工业化是一个极端分离的过程——如此极端的分离，以至于我们事实上可以这样大胆质疑：这一时期的美国经济增长是否可以被看成是整个国民经济的经济增长过程？

伴随着1877年大妥协（Compromise of 1877）的数十年，关于工业化的政治冲突更加尖锐，结束南方重建的政治安排换取了将拉瑟福德·海斯（Rutherford Hayes）抬升为美国总统。这一政治安排达成之后不满两年，美国就又重回国际金

本位制——这就为自 1865 年开始、并几乎与逐渐放弃重建南部地区的特定的政治努力相平行的一个漫长过程画上了句号。放弃南方重建实际上通过减少联邦军队的开支促进了美国重返黄金致富，并促进了南部的棉花种植业复兴，并且，至少对大多数外国观察家而言，美国作为一个整体，政局更加稳定。^⑨进而，联邦政府开支的削减使中央政府与美元纸币（绿背纸币）的流通建立了契约关系，以偿还大笔内战期间所借债务，并为重返金本位制存储黄金。这一由恢复以及随后维持黄金支付所强制的货币政策导致了严重的通货紧缩——事实上，比任何其他工业化国家在同一时期所经历过的情况更为严重，从发展的角度来看，这一通货紧缩的结果相当于使美国遭受了重创。^⑩

19 世纪与 20 世纪之交，1900 年《金本位制法案》让围绕着金本位制的旷世争斗与那场再次关注到美国领土扩展的政治争论终于画上了一个圆满的句号。尽管工业化的许多特征——特别是美国城市的增长，不断为美国政治增添光怪陆离的色彩，但是，关于殖民地的占领和平息对货币政策的公共辩论的新的争论，仍然标志着美国政治发展的一个重要转折点。当一些主要的地区仍然持续为美利坚合众国应该按照什么轨道发展而争论不休时，绝大多数政治上可靠的选择性发展道路可能已经指出，自此以后，美国仍将继续成为一个工业强国，并且将接受一切与此相关的政策，诸如坚持金本位制作为不可争辩的事实。^⑪

三项重大的发展政策支撑了 19 世纪晚期美国的工业化：一个不受管制的国内统一市场的政治结构；坚持国际金本位制度；对工业的关税保护政策。一个统一的国内市场将美国提升为“西方世界现代化进程的多个商务中心”。鉴于统一美国的国内市场是一个政治上的先决条件，阿尔弗雷德·钱德勒（Alfred Chandler）一直坚持认为，源于一系列具体的技术创新与大规模生产机遇的组合，美国的工业化是一个不可避免的事实：

在 19 世纪 80 年代到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美国现代工商企业的兴起基本上没有受到公共政策、资本市场或企业家能力的影响，这是因为美国现代工商企业的兴起，乃是一场更带有根本性的经济发展的一部分。现代工商企业……乃是对生产和分配过程中所发生的根本性改变在组织上的反应，这些根本性改变是由于出现了新的能源，以及将科学知识越来越多地应用于工业技术。铁路和电报的问世，以及在食品、石油、橡胶、玻璃、化学品、机器和金属等生产中新的生产方式的不断完善，使得实现一个在历史上空前的生产规模成为可能。源自于高出生率、不断下降的死亡率和大量移民所造成的迅速增长的人口，以及高水平的并日益增加的人均收入，有助于为这样一种生产确保持续和不断扩大的市场。运

输、通讯和需求的改变使得分销过程中发生了革命性的变化。如果新的大销售商难于应付新的生产过程的产量,制造商就会将大规模生产和大规模分销加以融合。这一发展的结果就是巨型工业企业的出现,他们直到今天仍然保持为现代市场经济中最强有力的、私人拥有并管理的经济组织。^⑤

然而,这段引文中所描述的现代商业企业都是从一个庞大、不受约束的国内市场上崛起的,而这一市场完全是由最高法院一手缔造出的政治成果。^⑥法官是由总统挑选的,并且得到那些精心关注他们的党性原则的忠诚度和对当时经济发展问题“固执己见”的参议员们的确认。其中,由各州独自推荐的被提名者针对州际贸易管制的态度最为重要——如果这些州能够管制州际贸易,那么,国内市场就可能被分割成为许多小的市场单元,并且可能严重延缓19世纪晚期美国的工业合并。^⑦因此,政策设计与政治争论意味深长地塑造了钱德勒与其他学者所一直梦寐以求的没有州际边界的经济王国。其结果是,美国工业化就是从大量的偶然可能性中产生的一个必然的结果。

第二个重要的发展政策是联邦政府坚持国际金本位制,从而保证了美元与主要国家货币(特别是英镑)之间汇率的稳定性。这一担保消除了外国在美投资所产生的主要的不确定性和风险,并由此决定了欧洲资本市场与美国资本市场相对紧密的一体化。^⑧尽管欧洲投资于美国铁路债券和政府发行的有价证券上的数额是相当可观的,但是,这一紧密一体化的最重要成果是使工业公司产生的巨额利润滞留在美国——要不是金本位制及其配套的中央财政政策的运作降低了投资于美国的风险,这笔巨额的财富完全可能被转移到国外去。尽管金本位制在当时多次遭到国会的攻击,但是,两党总统所率领的行政部门先后成功地在政坛捍卫了金本位制,并且强有力地金融市场上操作了这一政策。

关税政策保护了美国工业免遭外国工业的竞争,因此,促进了北部地区制造业快速地扩张。西部农业出口地区,以及(特别是)南部农业出口地区被迫从受到关税保护的国内制造商手上购买工业制成品,同时,成为竞争性世界市场的农产品——诸如小麦、棉花等的价格接受者。因此,在这一关税政策的约束下,贸易条件严重地不利于南部和西部地区。从经济意义上来说,“关税”一只手所给予的,则一定通过另一只手拿走;尽管关税的确通过提高工业制成品的价格进而增加利润的办法,增强了工业部门的资本积累,但是,所有这些产品的消费者基础,尤其是农业产品的消费者基础,则由施加于不同部门之间的关税而使得财富的再分配受到了严重的制约。可是,从政治意义上来说,在支持所有三项重要的发展政策的共和党阵营中,没有其他的政策能像关税政策一样维护起一个发展性的联